

建设人类的共生时代

池田大作（国际创价学会会长）

2020年1月26日

为了纪念创价学会创立九十周年，以及国际创价学会（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简称SGI）成立四十五周年，我想就建设一个人人享有尊严与安心生活的“可持续地球社会”，发表我的倡议。

首先，我要提及从年初以来，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着的紧张局势有所加剧。我强烈敦促双方继续努力保持自制，并通过遵守国际法和扩大外交努力，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我真诚希望，在联合国和其他国家的调解下，能够找出一条缓和紧张局势的道路。

我们的世界接连发生极端和具破坏力的气候异常现象。去年，欧洲、印度和其他地方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浪、超级台风和暴雨，引发世界各地洪水泛滥成灾。澳大利亚大规模森林火灾的破坏仍在持续。

正当人们日益担忧全球暖化的影响不断升级之际，去年9月于联合国举行了气候行动峰会。在会上，三分之一的联合国成员国（约65个国家）发表了在2050年前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方针^[1]。这份努力迫切需要扩大至全球规模。气候变化并不是一般的环境课题，它威胁着地球上全人类和子孙后代。气候变化和核武器一样，左右着人类的命运。

事实上，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所强调，“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问题”^[2]。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冲击，有可能使联合国至今为达致《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s）而在全球致力消除贫困和饥荒所做的努力，变得毫无意义。

然而，我们的焦点不应仅限于制止气候问题持续恶化。由于气候变化的问题无人能够幸免，为了谋求对策，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契机，促使全球人类达致前所未有的团结和行动。而我们能否激发这一潜力，其成败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问题。

此次气候行动峰会的特点，是由青年主导、要求改革的广泛行动，同时各国市政府、高等教育机构和私人企业，为应对气候危机采取了迅速和雄心万丈的行动。

本月（2020年1月）开始，国际社会试图全面实施《巴黎协定》，把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摄氏1.5度以内。联合国在迎接成立七十五周年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鼓励建立积极的反馈循环，通过这个循环，以集体的团结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同时推动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在此，我要通过三个观点，谈论形成这种强有力的行动与团结所需的要素。

不让任何人掉队

第一个观点，是决不把在困境中挣扎的人置之不理。

近年来，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破坏规模日益遽增，其中绝大部分是因异常气候所引起。无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幸免受到广泛影响。例如，去年日本由于台风“法茜”和“海贝思”的影响，造成猛烈的暴风雨袭击，引发大规模水灾，也使全国大部分地区停电、得不到净水供应，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这些影响往往集中在本已遭受贫困打击的社会弱势群体，如妇女、儿童和老人。这已是日益受到全球关注，也是联合国一贯重视的问题。这些群体更容易遭遇危险，经历灾难后重建生活也更加困难，因此需要给予适当和持续的支援。

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另一个悲剧，就是越来越多人被迫离开长期居住的家园。太平洋岛屿国家人民所面临的危机，尤其令人深切关注。由于海平面上升造成土地泛滥成灾，导致居民流离失所，很可能成为永久性问题，他们或许永远都无法重返家园。

本体安全

本体安全是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1991年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个人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感受到的秩序感、安全感以及连续性。举例来说，如果发生的事件不能符合个人认定的生存意义，就会威胁到个人自我认同中的归属感以及自信。就这一点而言，社会学家以及心理学家认为人为因素造成的气候变化会对本体的安全造成威胁。以社会的层面来看，从气候变化破坏的环境中搬迁出来，会打破人们与家园之间的连续联系，并危及物质上、社会中以及文化层面的安全。

我所创立的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为了要处理这个问题，在两年前发起一个研究项目，就是研究气候变化对太平洋岛屿居民的影响。这项研究所强调的其中一点，就是这些居民与自己家园之间具有的特殊联系。失去与家园的联系，相当于丧失最根本的自我认同。即使这些人搬到另一个岛屿，并获得物质上的保障，但同时他们会丧失生活在原来岛屿上的安全感，即报告中所称的“本体安全”。^[3] 该项目的结论阐明，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必须关注这种无法弥补的痛苦。

丧失与家园联系的悲痛，常是地震和海啸等重大灾害中难以避免的伤害。这种突然丧失亲友和家人的痛苦实在难以忍受。我在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和大海啸翌年（2012年）所发表的倡言中也强调，社会整体应及时对这种深度的痛苦采取缓冲之计。失去刻画生命印记的场所及弥漫日常生活气息的家园——对于如此难以言喻的痛苦，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1900-1944）如此形容：“早上播下橡树的种子，下午就想在其树荫下乘凉休息，那是不切实际的奢望。”^[4]

在讨论气候变化的影响时，一般倾向把重点放在经济损失或其他可量化的指标上，但这些宏观经济指数未必能反映许多人的实际痛苦。我认为，我们必须同时关注丧失家园的悲痛这一点，并为此共同努力寻求解决方法。

这方面与近年来不断加剧的贸易摩擦，有着结构性的相似之处。“以邻为壑”一词是指通过提高关税或限制进口来恢复本国经济的政策。然而，在全球化和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经济报复的循环往往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即被形容为“玩火自焚”、自陷贫穷的窘境。

贸易摩擦对许多中小型企业的业绩产生负面影响，令企业面对压力而要重整，并使员工失去工作。即使我们承认必须改善如贸易平衡等经济指标，但使国内外本已蒙受痛苦的弱势群体生活条件雪上加霜，则只会加剧全球性的社会不稳定。

在去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古特雷斯秘书长描述了他曾访问各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包括面对海平面上升，生命随时被吞噬的南太平洋家庭；梦想能够返回家园和学校的中东年轻难民；正在努力重建生活的非洲埃博拉幸存者。秘书长发出警戒说，“很多人担心被伤害、挫败，也担心掉队。”^[5]

我和他有同样的担忧。当我们考虑如何解决全球问题时，必须首先聚焦于对人的生命、生计和尊严构成的威胁。

气候与贸易的问题会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造成深刻的影响。在这方面，我认为创价学会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1871-1944）在1903年的著作《人生地理学》中的论点，值得我们关注。牧口会长把军事冲突的“临时性”与经济竞争的“持久性”进行了对比：前者是突然发生，并带来令人不得不警惕的可怕痛苦；而后者则是渐进式且以温和的方式发生，以至它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

牧口会长强调，由于人们意识到战争具有明显残酷的本质，从而通过如谈判或调解来防止更大的伤害。经济竞争的情况则不同，由于是持续且无意识地进行，其结果会被视为“自然选择”的决定。因此，它逐渐成为生活常态，让人轻易忽视由此造成的痛苦或非人道事态。

在牧口会长生活的时代，世界受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的蹂躏，一种牺牲他国来满足自国繁荣的风潮，被视为理所当然。但是，这种心态意味着，人们无可避免地要接受某些部分或群体的牺牲，他们遭受的痛苦与我们无关。这种行为就像一层沉积物或污泥，累积在社会深处。

结果，弱肉强食的经济竞争毫无节制，应验了牧口会长的警告，最终造成的痛苦比战争来得惨重。^[6]与牧口会长的时代相比，如今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进入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时代，风险也比过去任何时候来得更大。

牧口会长并不否认“竞争”在社会运作中的价值，认为通过相互琢磨，争相追求卓越，能孕育新的活力和创造力。问题是人们倾向于把世界视为“适者生存”的竞技场，认为自己是独立生活的个体，凡事只考虑自己，完全无视这样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牧口会长意识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共同生活”的场所。这是他的思想基础。

以此世界观为核心，牧口会长在《人生地理学》的绪论中，描述了他的具体感受。当他的妻子无法为新生婴儿提供母乳时，由于日本国内的奶粉品质欠佳，医生推荐了一种在瑞士生产的奶粉。牧口会长对在瑞士朱拉山下的牧牛人表示感谢。他还指出，孩子身上穿着用棉布制成的衣服，令他联想到在酷热中工作的印度制衣工人。^[7]通过如此的描述，他又指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一个孩子就与整个世界连系起来。他将对这些素未谋面的人的感激之情，归纳于“共同生活”这一个词汇中。这并非一种想象，即使人们常常忽略这个事实，但这才是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

世界是由无数人的重叠与相互交织的活动，以及所产生的影响构成的。不正视这一事实而持续竞争时，我们便会忽视那些遭受严重威胁与社会矛盾而受苦的人的存在。因此，“努力保护和改善自己与他人的生活”，应成为我们在社会共同生活与工作时常持有的自觉。^[8]这是牧口会长的核心思想。

当前，经济增长和努力防止全球暖化，两者间并无抵触。如2014年起的三年期间，全球经济年增长率超过3%，^[9]而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₂）的排放量却保持不变。^[10]但之后很遗憾地排放量又有所增加。然而，我相信通过“努力保护和改善自己与他人的生活”所作出的明智选择，如引进可再生能源及改善能源效益等措施，我们应该能够发展新的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

我认为，人类追求“共同生活”意识的基础，是要认同处于严重威胁阴影下的人与我们同样是人，没有不同。

为此，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阿比吉特·V·班纳吉（Abhijit V. Banerjee）和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在研究贫困问题与经济竞争之间的深刻关系时也强调，并非以宏观经济角度考虑问题，而是具体地从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进行研究。两位教授与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于2019年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班纳吉与迪弗洛二人合著的《穷人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世界上被认为最贫困的人，基本上与任何人没有不同，他们同样以理性思考。^[11]对于那些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来说，他们周围充满了“无形的助推力”，例如享有安全的食水或医疗制度等，他们已彻底地嵌入这一体系而浑然不觉。^[12]作者进而指出，穷人不仅过着风险更大的生活，即使遭遇同样一场灾难，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可能更大。^[13]班纳吉与迪弗洛提醒人们不要以“刻板印象”判断人，强调必须了解人们的实际生活。

因此，要理解人并非以社会地位或阶级来判断，而必须从关心他人所处的环境去理解。这也是SGI会员所秉持的佛教核心思想。佛典曾记载释尊对人的观察：所有生物之中，虽然各有不同，但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区别。人与人之间有所区别的，只是名字而已。^[14]

阿阇世王

阿阇世王（意思是未出生之前已结怨）是印度西北部摩揭陀国国王频婆娑罗王的儿子以及皇位继承人。当阿阇世还是王子时，就已经皈依释迦牟尼的表弟及宿敌提婆达多。频婆娑罗国王是释迦的虔诚信徒及施主，提婆达多唆使阿阇世王子杀害他，夺取王位。阿阇世王还多次与提婆达多串通危害释迦牟尼的性命，但是他后来为自己的恶行感到忏悔，于是寻求释尊原谅，投入释尊的门下，并协助释尊弟子在佛灭后的第一次集结，编纂整理佛陀的教义。

这段话的意思是，虽然社会以族群和名字来区别人，但就人性而言，人与人之间并无任何区别。

释尊不管对方的社会地位或身份如何，平等地为任何病人提供治疗，给予鼓励，包括路上巧遇患重病的僧侣，或曾策划置他于死地的阿阇世王。这两者之间有一共同点：僧侣因为被同伴遗弃，独自忍受着疾病和孤独；阿阇世王患有极度重病，令人不敢靠近。释尊为患病的僧侣洗澡，替他换上干净的衣服；即使知道自己生命接近临终也不惜找时间去见阿阇世王，以佛法的教导耐心引导，帮助他从疾病中恢复健康。

不让任何人被孤立受苦、不让任何人独自面对困境——从释尊的行动中，我们看见了佛教慈悲精神的原点。从佛法的观点来看，人的能力并非由先天决定，只不过是社会固有的观念来评估人的能力并加以标签而已。

即使某人发现自己处于困境，如果身边出现愿意与他并肩作战的同伴，就有可能找到前进的道路。同样的，当面临贫穷或疾病时，由于知道拥有同伴的支持，

便能大大改变面对困境时的姿态，这是佛教哲学的核心思想。牧口会长呼吁“有意识地共同生活”的生活方式，即立足于绝不遗弃任何与困难奋斗的人。

2008年，当发生震动全世界的金融危机时，我与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安瓦尔·K·乔杜里（Anwarul K. Chowdhury）进行了对谈。当时我们一致认为，必须最优先去支援面临严峻经济冲击的国家和社会弱势群体。乔杜里前副秘书长强调，需要建立一个全球安全网，以缓冲气候变化的影响、价格剧烈波动和极端金融紧缩等外部冲击。^[15]我完全认同他的观点。我们也一致赞同，联合国在二十一世纪必须扮演与社会弱势群体同在的关键角色。

2001年，联合国成立“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公室”，乔杜里前副秘书长作为首任高级代表，经常有机会与被国际社会遗弃的国家与人民一起工作，拥有第一手实践经验。他曾说，没有什么比看见最脆弱国家状况获得巨大改善更让他感到高兴的了。^[16]我对此深为感动。

为什么呢？因为创价学会在草创时期，曾被揶揄为“病人和穷人的团体”。我们通过相互鼓励，与无数被社会遗弃的平凡庶民一起从不幸的深渊站起来，这是我们感到无比自豪的一段历史。

户田城圣（1900-1958）与牧口首任会长共同创立了以庶民运动为根本的“创价学会”，并成为第二任会长。在当时令人愤世嫉俗的社会，户田会长持续行动，秉持如此的信念：我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拯救穷人、病人和正在苦恼的人们，因此我要大声诉说妙法。^[17]

户田会长最热切的愿望是从地球上消除“悲惨”二字。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许多国家的人民带来痛苦，他决心不让这些苦难重演。在二十世纪两次全球性冲突之后成立了联合国，这令户田会长对联合国抱有强烈的期待。他呼吁要守护和协助联合国成为世界的希望要塞。

六十年前（1960年），我就任创价学会第三任会长。同年，我前往美国，访问了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为世界和平采取了具体行动，这是为了要实现恩师的夙愿。尔后，我们把支持联合国作为创价学会投入社会建设的核心支柱，并加强与志同道合的人士和民间组织的合作，不断地为探讨解决全球性课题持续行动。

1960年，在我访问纽约后不久，作为联合国日（10月24日）庆祝活动之一，应当时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 1905-1961）的提议，在联合国总部演奏了贝多芬整部《第九交响曲》。过往依照惯例只演奏最终的第四乐章，尤其是那振奋人心的《欢乐颂》大合唱。适逢联合国成立十五周年之际，首次决定演奏整部《第九交响曲》。

哈马舍尔德向听众致辞时说道，《第九交响曲》一开始，我们就会进入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激烈冲突和黑暗威胁的世界。但是作曲家贝多芬带领我们勇往直前，在最后乐章的一开始，我们再次听到各种主旋律反复演奏，那是作为桥梁通往最终的统合。^[18] 将《第九交响曲》乐章的行进与人类历史相比，哈马舍尔德满怀希望地表示，我们一定要坚信，第一乐章出现之后，也总会有第四乐章出现的时候。^[19]

哈马舍尔德的信念与牧口会长在《人生地理学》中阐述的历史时代进程不谋而合。在二十世纪初，军事、政治与经济竞争的模式，是民众和社会以牺牲他人来谋求自身安稳和繁荣，这令牧口会长十分关注。令人遗憾的是，这仍然是我们世界现在的实况。

但是，正如《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的合唱一开端唱出：“啊，朋友啊，不是这些音调！”，我们绝对有能力以新的方法，改变根深蒂固的竞争模式。牧口会长提出，实质的变革必须来自他所提倡的“人道主义”或“人道竞争”模式，即为他人的幸福而努力工作的同时，也为自己谋取利益。通过全球一体的团结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我们能够且必须以这种变革的模式，开辟人类历史的新领域。

我认为，这项挑战的核心是承诺“绝不遗弃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通过履行这一承诺，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都能将气候变化这前所未有的危机，转变为改变时代潮流的契机。

从事建设的挑战

我要讨论的第二个观点，是共同采取建设性行动的重要性，而不仅停留于传达共同的危机感。

早在二十世纪80年代，世界已敲响警钟，警告是人为因素导致全球暖化。1992年5月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地球问题首脑会议）之前订立；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是为减少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015年12月则通过《巴黎协定》，这是作为包括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首个全球气候框架。

世界对气候变化的危机感日益加深，促使一个完整的全球气候框架应运而生。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进行了一系列科学研究，来协助人们更广泛地认识气候暖化的影响，而异常气象所带来的威胁，已经是一个明显的现实。

虽然《巴黎协定》从本月开始运作，但已可预想其未来将面临的严峻挑战。根据IPCC的特别报告指出，倘若气候以目前的速度持续暖化，将带来真正的危机，唯恐最早在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将突破摄氏1.5度；^[20]《巴黎协定》的目标就是要将全球暖化控制在这一限度内，所有国家必须立即加紧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为此，我们必须超越共同的危机感，提出一个明确的愿景，使各地人民能团结一致地积极参与。

如果人们只专注于自身所面临的威胁，将造成那些自认为没有受到直接影响的人对威胁漠不关心；即使意识到威胁的严重性，也可能被一种无力感所淹没，最终得出结论：他们感到无能为力，无法改变现状。

这一点令我想起和平学者埃莉斯·博尔丁（Elise Boulding, 1920-2010）博士曾与我分享的一段轶事。1960年代，当她出席一个研究裁军的会议时，博尔丁博士向与会专家问道：“一旦解除所有武装，世界将会变得如何？”没想到所获的答案使她诧异万分，他们回答说不知道——他们的工作只是提出如何解除武装。^[21]根据这一经验，博尔丁博士意识到，除非人们对“和平社会”有明确和具体的看法，否则几乎不可能团结起人们，追求和平。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SGI与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 简称ICAN）合制的“你所珍惜的一切——共创无核武器的世界”展，自2012年以来已在全球约90个城市展出。我们通过此展览鼓励大家努力实现和平社会的愿景，并为此致力推行广泛的活动。

一般而言，由于核武器的问题往往使人们联想到全人类会被毁灭，进而产生强烈的抗拒感，避而不谈。相对之下，“你所珍惜的一切”展的首个展板提出反思：对你而言什么才是最重要？通过引导观众去思考如何建立一个既能保障自己所珍视的一切，亦能守护他人认为不可替代事物的世界，培养为此采取建设性行动的共同愿望。

多年来，一直被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禁止核武器条约》（Treaty on the Prohibition of Nuclear Weapons, 简称TPNW），于2017年终于被通过了。这是因为随着人们对核武器所造成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的关切日益增强，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憧憬，人们更致力关注如何禁止核武器。这种强大的势头成为一个关键因素，推动和团结人使条约通过。

TPNW不仅强调核武器对全人类安全构成的威胁，正如其序言所表明，条约的核心是推动核裁军，进而建立一个保障人权和倡导性别平等、守护现代与后代人的健康，以及优先考虑生态系统完整性的世界愿景。

同样地，当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时，不仅要追求限制平均气温上升的数值目标，更必须制定一个想要共同实现的美好世界，积极地向着目标努力采取行动。

在应对建设理想未来的挑战中，我们找到了第三条前进的道路，可以避免人们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冷漠感，对自身无直接影响的问题不闻不问，或在面对压倒性的问题时，陷入过度悲观而感到无能为力。

1992年，SGI配合地球问题首脑会议的举行，在巴西成立了创价研究所亚马逊环境研究中心，此后该研究所开展了恢复热带雨林和保护其独特生态的活动。SGI为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而举办“变革的种子”和“希望的种子”展览，其标题带来明确的信息：从现在所处之地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潜力成为令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建设者；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将成为在全世界绽放尊严之花的“变革的种子”和“希望的种子”。

面对危机时应采取建设性的做法，强调这种积极态度的根本源自佛教哲学。在体现释尊教义精髓的佛教经典《法华经》中，阐明“娑婆即寂光”的法理。“娑婆”是梵文sahā的汉语音译词，意思是“忍受”或“忍耐”。“娑婆世界”一词涵括了释尊的洞察，即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痛苦和苦恼的世界。以这种世界观为前提，释尊毅然宣言“我二十九岁出家求善道”^[22]，如此表示他并不感到悲观，而是认真地去寻求避免人们被痛苦淹没，获得幸福生活的方法。

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曾研究释尊的生平与思想，他感铭释尊的慈悲而断言：“佛陀的教导并非一个认识体系，而是救济的道路”。^[23]

如果人们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充满苦难的地方，有可能会以错误的方式面对世界。例如，人们可能只顾自己摆脱痛苦，当面对社会的严酷现实时，即感到无能为力，逃避现实，或者陷入被动，等待他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释尊的本意并非指娑婆世界是一个人们受苦的地方，而是要为我们指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人们得以实现希望和梦想（寂光土）。这一法理在《法华经·见宝塔品第十一》中有详细解说：当许多人聚集在娑婆世界听佛陀说法时，一个巨大、闪耀着尊严之光的宝塔在众人眼前出现，将娑婆世界变为寂光土。

在十三世纪的日本，佛教僧侣日莲（1222-1282）阐述“娑婆即寂光”为“非去此往彼也”。^[24]换句话说，即人们所渴望的理想乡并非在遥远的他方。《法华经》的核心教导，应是更加努力行动，使我们目前所在之处变为璀璨的“寂光土”。

在日莲的时代，日本陷入近似永无止境的苦难。除了战乱，人民还遭受地震和台风等自然灾害以及传染病流行之苦。此外，社会上蔓延着利己主义、逃避现实的思想，或把人类描绘成没有力量的存在，这种思想形成令人们失去活力的恶性循环。

更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日莲以《法华经》宝塔出现的一幕，阐述了国土变革的过程。他强调，聚集在会座的人们所看见的宝塔，实际上就是他们“自身”。^[25]他教导我们如何觉醒人内在的潜能，即发现每个人心中存在与宝塔同等尊贵的璀璨光芒，一种能够照亮这苦难世界之光，也是我们人类无限潜能的源泉。另外，他还强调亲手创造自己渴望的世界的重要性，每一个人都要努力像宝塔一样闪耀光辉，奋力地让希望之光照亮社会。

2005年2月，我与环保运动家旺加里·马塔伊（Wangari Maathai, 1940-2011）展开对谈。马塔伊博士谈论了她如何从自己的周围环境开始，为世界点燃新希望之光的“绿带运动”。马塔伊博士回想该运动从种植七棵树苗开始，她说：“‘未来’并非存在于未来。‘未来’是通过我们‘现在’的行动而诞生。如果我们想在‘未来’实现某些事，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

我仍鲜明地记得马塔伊博士那如沐春风的灿烂笑容。当时日本创价大学的学生用她的母语“基库尤语”（Kikuyu）合唱“绿带运动”之歌，热情迎迓她的到访。

“这是我们的土地
这是我们的使命
在这里植树”

当我看着博士与学生们一同唱和，随着歌曲节奏摇摆身躯时，我不禁感到眼前这一幕正是从事建设的挑战所带来的喜悦。这种从她自身散发出来的喜悦，成为将植树运动推广至肯尼亚，甚至扩大到整个非洲大陆的原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我与马塔伊博士的会面，是在全球首个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框架的公约《京都议定书》生效的两天后。或许与这历史性的里程碑相比，马塔伊博士在肯尼亚发起的运动并不那么引人注目。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她通过行动激发人类的希望越来越大，并获得支持，最终发展成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的一项运动，而且在她去世后仍继续推行。通过这项倡议，全世界种植了超过150亿棵树。^[26]此外，在去年举行的气候行动峰会上，从巴基斯坦到危地马拉，世界各国都承诺种植超过110亿棵树。^[27]

我至今仍难忘马塔伊博士一段铭刻我脑海里的话语：即使我们认为，一个人的行动或许非常渺小，但试想想，如果将它重复几百万次，这将带来改变。^[28]

她的话语，令人感到一种来自挑战建设的巨大喜悦。

SGI的“希望的种子”展览介绍了如马塔伊博士般发起草根运动的个人实例。另一位介绍的个人实例是未来学家海瑟·亨德森（Hazel Henderson）和她对抗空气污染的运动。促使马塔伊博士采取行动的契机，是来自故乡被视为神圣象征的无花果树，由于经济开发而被砍伐殆尽。对亨德森博士而言，则是当时她居住的纽约市空气污染严重，年幼的女儿从学校回家后皮肤沾满煤烟灰，促使她投入环境运动。

两人的出发点都来自内心极度痛苦的经历，使她们强烈地意识到什么是最珍贵的、绝不能失去的东西。但她们并没有因这种痛苦而放弃自己。马塔伊博士致力于扩大她的运动，决意打破贫穷和饥饿的恶性循环，并通过植树来孕育和平。同样地，为了让孩子再次呼吸到洁净的空气，亨德森博士开始与志同道合之士合作。她们两人都把痛苦转化为建设的能量，使她们得以实现自己所憧憬的理想世界。

在介绍了这些故事后，作为“希望的种子”展览总结的展板上，描绘了一棵大树，树枝茂盛地向外伸展且长满许多树叶。在此，观众也受邀一起来思考，从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始，他们愿意展开什么挑战，以在世界种植希望的种子。

为了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从本月（2020年1月）开始的“UN75”倡议，旨在激发起更多的对话和行动，以明晰我们如何在面对诸多挑战情况下，建设一个更美好世界。在创造各种不同形态的对话机会的同时，该倡议特别重视接触那些易于被国际社会忽略的群体，多倾听他们的希望和恐惧，并从他们的经验中学习。^[29] UN75的目标是通过即将开展的对话，为2045年联合国一百周年纪念构建一个全球愿景，并为了实现此愿景而展开各种合作行动。

由于气候变化是联合国在推动对话的核心课题之一，我们必须利用这一机会，关注直接受到深刻冲击的民众，理解和关切他们所承受的严重恐惧，并通过他们的经历引发出建设一个更美好世界的积极行动。从直接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人们开始，大多数民众的观点，都是我们所期望的未来全球愿景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关键在于将这些重叠的部分组合起来，创造出一个基于人类实际生活经验的拼图。

我相信，通过这些对话产生的共同努力，并扩展这项让人们彼此联系与共享的愿景，我们能加速对抗全球暖化的步伐，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全球社会的团结基础。

青年主导的气候行动

我要提出的第三个观点，是努力使今后的十年成为青年为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十年，以配合“联合国行动十年”于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30]

去年9月，在召开各国首脑气候行动峰会之前所举办的“联合国青年气候峰会”，是联合国以全新姿态的出发，因为它突显了以下特征：

- 一、来自逾140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超越各自国家的立场，作为同一世代的成员与会；
- 二、峰会期间各项论坛由青年担任主持人，而非联合国官员；
- 三、有别于联合国会议标准议程以逐个代表轮流发言，峰会以生动地交换意见的方式举行会议。

更重要的是，古特雷斯联合国秘书长于开幕式上作为主旨发言聆听者参加^[31]，专注聆听青年代表的每一项发言。

2006年，我曾向联合国提出改革建议，希望每年在联合国大会的筹备期间，可以先举行青年代表大会，让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参加，令世界领导人有机会听取下一世代的意见。我认为青年气候峰会正是作为先驱的模范。

此外，“全球气候罢课”运动在国际社会也为气候行动造成势头与浪潮。于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举行的仅一周内，在185个国家就有超过760万人参加了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应对全球暖化的集会。^[32]该运动受到瑞典高中生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的启发，她于2018年夏天开始罢课，要求对气候危机采取更有力的对应措施。她的行动立即引起了各地青年们的共鸣，也获得各年龄层人士的支持和参与。

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曾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在巴黎气候会议上发挥了关键作用，目前领导“2020任务”——一个旨在确保《巴黎协定》的目标得以实现的运动。她表示：参加此运动的人们，表示他们的愤怒是有理由的，尤其青年们，他们理解科学，知道气候变化对自己人生会有什么影响，也知道气候变化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33]

她解释道，青年们知道变革并非不可能，所以他们才对防止全球暖化的缓慢进展表示愤慨。为了向前迈进，她期待今后这种“愤怒”与“乐观主义”能相辅相成地产生更强大的力量。

菲格雷斯女士于去年2月访问了日本创价学会本部。她之后在《圣教新闻》撰稿中回顾了让许多人认为不可能的《巴黎协定》生效的过程。她强调，欠缺乐观主义就没有通往胜利之路。^[34] 我不禁感到，当青年对变革现实的热情和不屈不挠的乐观主义相融合时，将产生无限的可能性。

青年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已促进世界各地许多人民及团体加速行动。比如在高等教育机构，目前有超过1万6000所大专院校通过一项宣言，承诺与学生合作解决危机。他们的行动计划包括：致力于碳中和、为气候相关研究提供更多资源、在校园及社区加强环境及可持续发展教育。^[35]

另一个例子是动员世界各地的城市和地方政府，其中《全球市长气候与能源盟约》已扩展至138个国家，超过1万名成员。这些城市都承诺采取积极措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36]

阿根廷学生活动家布鲁诺·罗德里格斯（Bruno Rodríguez）在联合国青年气候峰会上发言表示，应对气候变化的年轻变革勇士，正在建立一种新的“集体意识”^[37]；事实上，年轻一代的能量和热情正在引发一个正面的因果循环。

当目睹这新世代的跃动，令我想起罗马俱乐部联合创始人奥雷利奥·贝恰（Aurelio Peccei, 1908-1984）于1981年时曾写道，要推行公正与民主的道理，就要倾听青年们的心声。^[38]

罗马俱乐部在半个多世纪前已因发出地球及其资源有限的警告而闻名，早已形成了对“可持续性”概念的思考。贝恰博士作为核心人物发挥作用，他强调，必须给予年轻一代更多机会去采取行动，发挥想象力和领导力。从1975年开始，我与贝恰博士曾五次会面，他所强调的观点至今依然鲜明不变。

倾听青年的声音，既不是一个选项，或者是“更好”的选择。如果我们真正关心未来，这是唯一合乎道理的前进之路，是我们不能略过的一步。这是他不屈的信念。

贝恰博士身为一名企业家，所投身的事业皆获得丰厚报酬与卓越成就，但最终却毅然决定放弃一切，创立罗马俱乐部，是因为他有了深刻的觉悟，即使把所有努力集中于各项事业或计划，但在推进各项活动的同时，与之相依的母体——即地球的状况却一直恶化下去，最终所有努力也可能是徒然。^[39]

出于这种危机感，罗马俱乐部于1968年成立。然而在成立初期却没取得任何显著的成果。尽管尽了最大的努力提醒人们关注地球所面临的生存挑战，但“很多

人犹如听说是其他星球的问题一样”毫无反应。更甚的是，即使那些对俱乐部活动的意义表示赞赏的人，也会持着“只要这些活动不侵犯自己的利益或日常活动即可”的心态。^[40]

直到四年后，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出版了报告书《增长的极限》而举世瞩目。这份报告产生了重大影响，即警惕世人关于地球及其天然资源的有限性。然而，仍有许多评论谴责报告的内容过于悲观。贝恰博士却不为所动，他始终坚信，重要的是迅速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第一步。^[41]他从未放弃对每个人内在无限潜力的确信。

SGI成立数月后的1975年5月，我与贝恰博士第一次会面。贝恰博士是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 1889-1975）向我推荐的人物之一。就在《增长的极限》出版一年后，我于1973年5月在伦敦拜访了汤因比教授，我们在两年间进行了约四十小时的对谈。之后，汤因比教授希望我能和他的朋友继续对话，他推荐的其中一位人物便是贝恰博士。

当我们在商讨下次访问欧洲期间能否会晤时，贝恰博士听说我们将在美国关岛举行第一届世界和平会议，特别发来了贺电。

1975年1月26日，我在SGI成立日的世界和平会议上，于芳名录的国籍一栏写下了“世界”。以SGI日为起点，我想以“世界”二字概括牧口首任会长和户田第二任会长的精神。牧口会长主张，应自觉世界是世界公民彼此共存的地方，而不仅仅视自己为特定民族或国籍的一员。户田会长的决心是无论任何国籍，任何人的权利和利益都不应遭到践踏，他称之为“地球民族主义”。

四个月后，当我会见贝恰博士时，他手上拿着刚出版的小说《人间革命》的英文译本，这是我撰述关于牧口和户田两位先师创立创价学会的历史小说。当时，贝恰博士对我们所推进的“人性变革”运动——即通过每一个人觉悟及发挥其内在潜力来变革时代——有着深刻的共鸣。他对此的肯定，在当时对我确实起了莫大的鼓励。

贝恰博士在与我的对谈集《二十一世纪的警钟》（又名《为时未晚》）中指出：“我们每个人都天生具备这种未开发、未使用过的资源和能力。可以发挥它们的作用去纠正人类正在日益恶化的状态。”^[42]

现今，世界上众多青年为气候危机英勇地挺身而出，这正是贝恰博士所期望看见的青年力量的展现。

在《增长的极限》出版期间，人们所关注的是污染和资源枯竭等问题。如今，造成气候变化的因素已经与我们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密不可分，使问题更难解决。

循环型经济

循环型经济是一种经济模式，目的在于争取资源尽可能最长的使用期限，并在使用过程中取得最大的价值，在使用寿命结束时，又能回收及再生产品与材料。循环型系统运用了再利用、分享、修缮、整新、重新制造以及回收等机制，在这个系统中，产生的“废料”变成投入其他制程的资源。相对于这种再生的方式，传统的线形经济奉行的是“取得、制造、丢弃”的制造模式。

在去年10月举行的欧洲议会上，罗马俱乐部现任联合主席桑德琳·迪克森·德克勒夫（Sandrine Dixson-Declève）介绍了罗马俱乐部的“地球危机计划”，当中提出向“循环型经济”转变所须的十项紧急行动，包括转向使用低碳能源及扩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等。^[43]

正因为气候变化问题如此复杂，需要多角度的应对方式，我们可以将气候变化的挑战视为契机，展现人类无限潜能的多元性。在SGI代表参加的青年气候峰会上，众多的论坛显示了其多元化范畴，从环境保护、创业、金融、技术、艺术、体育、时尚、社交媒体及话题性视频内容等多个角度，以新的构思来找寻解决方案。

这里，我要强调在青年气候峰会之后，立即在联合国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首脑会议政治宣言》。此宣言将迈向2030年的十年期间定为“可持续发展落实行动十年”^[44]，并特别提出要和青年建立持久的伙伴关系。

根据这一宣言，古特雷斯联合国秘书长发起了一个新的“行动十年”，呼吁在全球和社区层面采取行动，并吸引青年参与主流活动。于此，我强力主张以青年为主导，积极去寻找解决气候危机的办法。

根据这一宣言，古特雷斯联合国秘书长发起了一个新的“行动十年”，呼吁在全球和社区层面采取行动，并吸引青年参与主流活动。于此，我强力主张以青年为主导，积极去寻找解决气候危机的办法。

格蕾塔·通贝里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导者，于上个月（2019年12月）在马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5）上，她在致辞中强调直至2030年这未来十年的重要性，并疾呼：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变革全都是从民众开始的。无须等待，让我们从这一刻开始变革。^[45]

为此，我提议每年举行青年气候峰会，作为联合国开辟新轨道的途径，并建议联合国与民间社会密切协调，使今后十年成为世界各地青年领导应对气候变化的期间。

此外，为巩固这一趋势，我建议安全理事会采纳一项决议，让青年持续参与相关气候的决策。这将遵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250号决议，敦促成员国加强青年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中的作用。

今年9月，预定举行纪念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的高级别会议。世界的青年应作为主要伙伴受邀参加。上述安理会决议的通过，将标志着青年主导“行动十年”的开始，也会开启联合国历史的新篇章。

2014年由日本创价学会青年发起的“创价全球行动”，今年作为“创价全球行动2030”（SOKA Global Action 2030）重新启动，旨在建立一个致力实践减碳承诺的草根运动，以“我的十大挑战”来鼓励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减碳的足迹。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道路绝非一帆风顺，也绝非容易。然而，我深信，只要青年团结一致，就不会有无法打破的僵局。

为TPNW提供支援

接下来，我想针对四个主要领域提出具体建议，以建立一个人人可以活得尊严和安心的可持续全球社会。

第一个是关于《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我要强烈呼吁，必须确保条约在今年，即广岛和长崎原子弹投下七十五周年内生效。这将使2020年成为人类终结核时代的一年。

自2017年7月通过以来，TPNW至今已获得80个国家签署、35个国家批准。^[46]为了早日实现使条约生效所需的50个批准国，各国必须加速批准与签署的步伐。

其中，美国与俄罗斯核裁军基础的《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的失效，将导致核军备竞赛卷土重来。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主任蕾娜塔·德万（Renata Dwan）警告说，全球使用核武器的风险，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47]因此迫切需要使TPNW早日生效，以强力扭转这一趋势。

目前，没有任何有核武器国或依附核武器国加入TPNW，但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核武器^[48]的TPNW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体现了以广岛和长崎的“原爆幸存者”（日语“Hibakusha”）为首，世界上受到核武器开发和实验的受害者的誓言：绝不允许其他人再遭受同样的痛苦。

数十年来，联合国接连通过决议，寻求解决核武器问题的方案。首先是194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一项决议，即是要求消除原子武器。正如古特雷斯秘书长所强调：彻底消除核武器是“联合国的DNA”。^[49]

放弃核武器计划的国家

国家	放弃核武器年份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立场	说明
阿根廷	1990	1995 (签署)	放弃制造核武器
白俄罗斯	1991	1993 (签署)	归还核武器
巴西	1990	1998 (签署)	放弃制造核武器
伊拉克	1991	1968 (批准)	放弃核武器计划
哈萨克斯坦	1991	1994 (签署)	归还核武器
利比亚	2003	1968 (批准)	放弃核武器计划
大韩民国	1970年代中期	1968 (批准)	停止钚的提炼计划
南非	1989	1991 (签署)	拆除核武器库
瑞典	1960年代	1968 (签署)	放弃核武器计划
乌克兰	1991	1994 (签署)	归还核武器

而TPNW的签署和批准的进度，与五十年前（1970年3月）生效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简称NPT）没有明显差别。当NPT生效时也只有97个国家签署和47个国家批准而已。然而，因为NPT的存在，逐步使禁止核武器扩散成为规范。许多国家在考虑核选项时，自愿放弃核武器。原本开发并拥有核武器的南非，自愿放弃核武器计划，销毁并拆除了核武库，加入NPT行列。

不扩散核武器在NPT生效之前只是处于一种“理想”阶段。但一旦条约生效，随着批准国增多，“理想”就变成“现实”，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正如NPT这一先例所示，即使在最初阶段似乎不可能大幅度地增加缔约国，但条约的生效具有把世界导向新方向的影响力。

关于建立国际规范的重要性，我想引述两位TPNW先驱梅拉夫·达坦（Merav Datan）与于尔根·舍弗兰（Jürgen Scheffran）于1997年起草，并提呈联合国作为讨论文件的《核武器示范公约》（Model Nuclear Weapons Convention，简称NWC）中所论述的观点：如果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间的领域区分，表示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那么

NWC就是把理想成型、将NPT在现实中具体化的条约。TPNW体现了理想与现实这两方面。由于还未获得有核武器国的签署，所以可以说它是理想；但条约的存在本身就是现实。^[50]

他们进一步强调，实际上如果存在反对条约和反对裁军的势力，也不会消灭规范本身的价值。^[51] 我对此深表赞同。

因此，今后要全力关注的是TPNW生效后所立定的“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核武器”，任何国家都无法对此提出质疑。

根据国际禁止核武器运动（ICAN）伙伴之一“挪威人民援助组织”2019年的报告，目前有135个国家支持TPNW；^[52] 表示支持TPNW的城市数量也在增加。ICAN于2018年发起的“号召城市活动”（Cities Appeal），除了有核武器国的美国、英国、法国以外，依附核武器国的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西班牙、

挪威、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以及瑞士的城市也参与其中，当中包括有核武器国的首都华盛顿和巴黎，以及依附核武器国的首都柏林、奥斯陆和堪培拉。^[53]

2019年10月，当局向联合国提交收录了1050万个签名的《原爆幸存者的呼吁》请愿书，其中包括许多有核武器国和依附核武器国的公民。^[54] 由广岛与长崎的原爆幸存者于2016年发起、创价学会和平委员会支持的请愿书运动，呼吁所有国家加入TPNW。

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缔约国第一次会议

在《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生效后的第一年内，缔约国应举行第一次会议，明订裁撤本国核武器以及移除外国核武器的最后期限。为了使条约生效，TPNW至少要有50个国家批准。直至2020年1月26日，有80个国家签署，35个国家批准。条约的支持者建议，缔约国应该在第一次会议中考虑，以十年为撤除所有核武器的最后期限。

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结集来自全球不同形式的反核民意，一同果断地推进禁止核武器，使之成为社会规范。为此，我建议在广岛或长崎举行“朝向无核武器世界的人民论坛”，落实TPNW缔约国第一次会议，以符合条约生效后一年内举行会议的要求。

论坛将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原爆幸存者、支持TPNW的自治政府和民间社会的代表。提议举行此论坛的原因，是为了使禁止核武器成为全球人类的规范。辩论的基础，应该是共同确认使用核武器所带来的恐怖后果，以及确保这不会发生在任何的国家上。

我真诚希望，日本作为战时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将继续尽力推进核武器非人道性的国际议论，并成为有核武器国与无核武器国之间的沟通桥梁。

突破过去逾七十年来重重障壁，使TPNW开始谈判的突破口，就是从2013年开始召开了三次的核武器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国际会议。通过这些会议阐明了以下的重要观点：

- 一、任何国家或国际机构，都不可能充分地应对引爆核武器后最初所导致的人道主义紧急事态，并为受影响的人提供足够的支援；
- 二、引爆核武器所导致的冲击不会受到国界的限制，它会带来长久的毁灭性效应，甚至可能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 三、引爆核武器所导致的间接效应，包括阻碍社会与经济发展，破坏生态系统，而且这些效应会集中在贫穷弱势群体的身上。

会议的讨论观点从“以核武器维护国家安全”的立场，转向“使用核武器如何影响全人类”的立场，从而促使TPNW获得进一步的谈判。

2018年10月，随着TPNW被通过，负责监督1966年《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一般性意见，指出“核武器的使用与威胁，与尊重生命权利势不两立”。^[55]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将“生命的权利”界定为即使在紧急状况下也“不允许克减的最高权利”^[56]，突出了其在国际人权法中具有的独特地位。这样就明确了以核武器威胁或使用核武器，就是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核心权利，这确实是个重大发展。这一点也是我的恩师户田城圣会长于1957年9月发表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的核心思想。

上文提议的“朝向无核武器世界的人民论坛”的关键主题应是“生命的权利”，从国际人权法的观点，集中讨论核武器的非人道性。我也呼吁，论坛可作为人们相互交流的机会，分享禁止核武器后对未来世界的愿景。

在制定TPNW时，不曾被视为与核武器问题相关联的性别观点，也被纳入条约之中。原因是一次辩论中，一位妇女强调女性遭受核武器伤害的情况长期被忽视，其后才纳入此观点。2014年12月在维也纳举行的“核武器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会议”上，核信息和资源服务部门的玛丽·奥尔森（Mary Olson）明确指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核武器的放射性伤害。这促使进一步的讨论，最终在TPNW前言中加入以下一文段：

“妇女和男子的平等、充分、有效参与是促进和实现可持续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因素，并致力于支持和加强妇女对核裁军的有效参与。”^[57]

这是从性别观点阐明了通过禁止核武器所创造的未来世界愿景。

创价学会多年来整理和发表来自广岛与长崎的原爆幸存者证言集，也收录了许多妇女的体验。2016年出版的《妇女们的广岛》，通过14名妇女的证言，描述了她们于原爆后幸存下来所面对的痛苦，如对放射性后遗症的恐惧，以及在生活中不断遭受与婚姻和生育有关的偏见与歧视。^[58]然而，她们的心意不限于“绝不让人经历同样的痛苦”。正如该书的副题所标示——“迈向笑容灿烂的未来”，她们誓愿要共同构筑一个母子都能安心生活的和平世界。

为了让TPNW更为普及和增加支持，重要的是必须让更多人分享彼此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希望和决心。不只是那些关心和平裁军的人，更要结集关心性别、

人权问题及家属子女与未来的人。我深信，当人们广泛支持并超越国籍与立场的差异，作为全球人类规范力量的TPNW，更具影响力。

核裁军多边谈判

我要提出的第二个具体建议，是关于使核裁军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政策。具体来说，我呼吁将两项协定列入4月和5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NPT缔约国审议大会的最终成果报告。第一份协定是开始多边核裁军的谈判；第二份协定则是商讨包括人工智能（AI）和核武器在内的新兴技术问题。

关于第一点，我认为有必要延长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简称《新裁武条约》），然后就核裁军展开多边谈判。原定于2021年2月到期的《新裁武条约》框架规定，两国的战略核弹头数量将减至1550枚，并限制已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及其他运载系统等数量至不超过700枚。虽然条约可以延长五年，但目前谈判已陷入僵局。

继《中导条约》被取消后，如果连《新裁武条约》框架也失效，将造成自半个世纪以来两个大国的核武库首度失去制衡，以及面临新的核竞赛的风险。此外，小型核弹头和超音速武器的加速发展，产生了在未来面临地理限制范围内的冲突时，将考虑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这使《新裁武条约》有绝对必要延长五年期限。

有鉴于此，NPT审议大会应鼓励暂停使核武器现代化。缔约国应达成一项共识，在2025年下一届NPT审议大会之前，启动多边核裁军谈判。

NPT在过去五十年的历史中，唯一达成核裁军框架的只有美国和俄罗斯，多国之间的真正核裁军框架从未实现过。我们必须在2020年审议大会上重申，NPT是所有有核武器国在核裁军上的共同目标，并承诺要把它达成的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进而采取具体的有效行动。

虽然有各种具体措施可达致目标，但我提议，在将《新裁武条约》延长五年的基础上，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应开始就新的核裁军条约展开谈判，首先着手讨论有关核裁军的核查制度。

借鉴美国和俄罗斯积累的核查经验，以及五年前在许多国家参与下开始的“核裁军核查国际伙伴关系”的讨论，这五个国家应该开始商讨核裁军的障碍。通过这一对话建立信任，进而推动为削减核武器的数量目标，开始实质性谈判。

为了创造多边核裁军的条件，我认为重新审视促进冷战结束的“共同安全保障”观具有价值。“共同安全保障”是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1927-1986）所领导的委员会为全球安全所撰写的报告标题。该委员会于1982年6月将报告提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Second Special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Devoted to Disarmament，简称SSOD II）。报告基于“核战争没有胜利者”这观点，敦促在意识上进行转变：“所有国家不能再以牺牲对方来谋求自国的安全。意即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安全。”^[59]我对此想法深有同感。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SSOD）

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之间，和平运动及反核运动增强了力道，推动了核裁军，也结束了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在这样的背景中，联合国大会召开了三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1978年的SSOD I，1982年的SSOD II以及1988年的SSOD III。自1983年开始，池田大作每年发表和平倡言，他以佛教哲学作为基础，力陈反对核威胁的立场。在这之前，他也向SSOD I和SSOD II提出了建议。在对SSOD II的建议中，他呼吁成立“维护联合国世界公民议会”，不只是政府，一般人民也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在SSOD II发表的倡言中也谈到：“在庞大的核战力量对峙的情况下，不论怎样增强军事力量，也根本不可能确保真正的和平。”^[60]

前一年的1981年，在美苏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美国总统罗纳德·W·里根（Ronald W. Reagan，1911-2004）表明他与苏联对立的立场，并暗示有可能发动小规模核战争。里根后来描述了他当时的感受：“我们的政策是基于实力和现实主义，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实力带来和平，而不是通过一张纸去决定和平。”^[61]

然而，随着欧美市民反核运动的高涨，并深刻理解到使用核武器所带来的毁灭性破坏后，里根强烈地感到绝对不可以发动核战争。

他也开始考虑到美国的核竞赛对手——苏联人民的实际感受。他回顾写给当时苏共中央总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1911-1985）的信函：

“在寄给契尔年科的信中，我说我们直接且非公开的书信来往对双方都有利益。我很努力运用我当演员时纯熟地投入感情的技巧。……我继而说我理解到苏联有部分人真的对我们美国感到恐惧。”^[62]

通过这样的沟通，里根以苏联人民的感受为对照，实感到自国人民的恐惧。于是他开始寻求与苏联领导进行对话，最终于1985年11月在日内瓦峰会上实现了与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首脑会谈。戈尔巴乔夫也同样意识到解决核问题的必要性，他们持续坦率的对话，终于达至共识，并发表联合声明：“核战争没有胜者，同时我们绝对不能发起核战争。”^[63]

这反映了近似“共同安全保障”的思维，引致美苏最终于1987年12月签署了《中导条约》，成为终结冷战重要的作用。当今，围绕着核武器的紧张局势再度

加剧，世界面临着被称为“新冷战”的局面。如今比过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恢复“共同安全保障”的精神，为此，我提议在NPT审议大会的最终文件上，将“核战争没有胜者，同时我们绝对不能发起核战争”列入为NPT全缔约国的一项宣言。

联合国于2018年5月发布的《裁军议程》呼吁，要实现“为挽救人类的裁军”^[64]。联合国裁军事务副秘书长兼高级代表中满泉（Izumi Nakamitsu）在报告发表翌日的演说中，如此形容裁军与安全之间的关系：裁军是国际和平与国家安全的原动力，为了确保国家安全的有用手段……裁军不是要追求一种乌托邦似的理想，而是追求如何防止纠纷，在何时何地也要缓和其影响的具体方法。^[65]

通过把核裁军谈判作为实现自身安全的有用手段，我们可以减少其他国家感到的威胁和不安，从而也消除我们自己所感到的威胁和不安。

以这种互利双赢为基础，现在正是强力促进NPT第六条款所承诺的诚实履行核裁军的时候了。

还有一点，我希望在NPT审议大会上达成共识的，就是加深对核武器相关系统的网络攻击，及将AI导入此类系统的运作所构成威胁的认知，进而开始商讨制定禁止条例。

尽管利用AI、互联网和其他网络空间的新技术在许多方面为社会带来积极的好处，但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技术在军事用途中的应用也正在迅速扩展。

去年3月在柏林举行了一次讨论这类新兴技术所构成挑战的会议。来自北约国家、欧盟成员国、俄罗斯、中国、印度、日本和巴西的政府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焦点就是谈论被称为杀手机器人的致命自主武器系统（LAWS），以及新的技术为核武器和其他武器所带来的影响。德国、荷兰和瑞典的外交部长在会上发表了一项政治声明，他们一致认为：我们有必要为技术进化的军事能力如何改变战争性质，及其对全球安全的影响达成共识。^[66]

新技术的开发速度惊人，依附核武器国也对此表示关注。因此，我提议在NPT框架内立即就这问题进行商讨。

1995年决定将NPT无限期延长时，缔约国一致认为，审议大会不仅应评估过去各项承诺的结果，而且应确定今后寻求进一步发展的领域，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67]考虑到核武器与新技术问题的迫切性和风险范畴，我认为这必须是最优先去处理与检讨的问题。

以网络攻击为例，不仅会影响核武器的指挥与控制中心，也会影响包括预警、通信和运载系统在内的各种相关系统。在最坏的情况下，对这些系统中的任何一环进行网络攻击，都可能导致核武器的发射或爆炸。

关于这个问题，古特雷斯秘书长表达了以下关注：

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也适用于网络空间的共识已经存在。但实际上国际法如何适用，同时对于国家在法律的框架内发起恶意的敌对行为时应该如何应对，尚未达到共识。^[68]

作为开创先例的手段，必须在NPT框架内立即采取行动，禁止对核相关系统的网络攻击，以减少核风险。

同样，在核武器系统中引入AI也存在极大危险。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SIPRI）去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有核武器国引入AI的好处，除了能消除某些限制，例如疲劳和恐惧感，以及随着时间流逝导致人类体能的下降外，它也能扩大系统的覆盖范围，并进入如深海和极地等人类难以执行任务的严酷环境。^[69]

但报告也警告说，过于依赖AI将会影响核武器操作的稳定因素，从而增加核风险。以核威慑为例，其本质在于对敌人意图的心理依赖。^[70] 报告指出，AI最近取得的进展，将使人们不再可能了解敌人的实际意图。如果AI在核武器系统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些技术的不透明性质——其内部运作难以理解，如黑箱作业一般——将越来越难以预测敌人的意图，从而令焦虑和猜疑升级。^[71] 报告还指出，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为了研究对方的战略形态和行动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努力，虽然对于国防有关代表来说未必有生产性，但最低限度他们仍频繁地会面。^[72]

当我们谈论心理认知之余，我认为通过双方经常会面所积累的经验，实际上提高了双方预测彼此行动的能力。在冷战期间，由于错误的信息或装置故障，电脑系统误传导弹来袭，引发危急状态。然而，由于监督系统的人理智地相信他们的直觉，对监视画面的信息存疑并建议不作反击，因而得以遏制核危机。在黑客攻击和网络诈骗横行的现今，当我们分析网络攻击的相关风险时，加速采用AI将使此类系统更容易受到错误和伪造信息的攻击。

无论依赖AI的核武器系统如何发展，人们应该无法接受由一台机器来主宰核按钮的最终控制权。然而，眼下必须处理的事实，就是有核武器国争先将AI引入军事应用，将给全球社会造成严重威胁。虽然使用AI可提高速度并带来军事优势，但也可能导致两难局面，例如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1917-1963）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1894-1971）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所面临的进退两难局面，如今的应对选项变得更少。

在回顾这个震撼全世界危机的教训时，肯尼迪曾经说过，有核武器大国，一定要避免强迫对方陷入屈辱地撤退和发动核战争之间二者选一的局面。^[73] 这番话反映了当年他们与灾难擦身而过的惊险，道出当时情况恶劣的程度。即便如此，当时两位领导人还有十三天审议的时间。但现时越来越追求速度，令随时被敌人超越的压力增加，因此大大减少能够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作出决策的空间。

SIPRI的报告也指出，为了寻求更快、更高智能、更准确和更通用的武器，会导致军备竞赛的不稳定。^[74] 我强烈认为，将AI应用于核武器不但未能防止核战争，反而会鼓励使用核武器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

我认为，正如NPT的序言所表明，其精神是承诺竭尽全力避免发生核战争的危险。展望未来，所有NPT缔约国必须在此基础上，对网络攻击和应用AI的课题进行辩论，同时考虑应否继续依赖核武器作为安全保障的有效方法。

重视被忽略的群体

我的第三个建议，是有关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

应对气候变化，不仅限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还迫切需要采取措施，降低极端天气造成的损害。这也是上个月（2019年12月）在马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5）讨论的主题。

根据国际发展和救援非政府组织“乐施会”（Oxfam）在COP25之前发布的一份报告，过去十年间，与气候相关的天气灾害增加了五倍。由于气候变化在全球导致流离失所的人数，远远超出受到地震或武装冲突等灾害的人数。^[75]

在此我建议，在日本举行以气候变化和减少灾害风险为重点的联合国会议。

自2007年以来，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简称UNDRR）召开了全球减少灾害风险平台（Global Platform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简称GP），让各国政府代表和民间社会代表参加，最初每两年举行一次，2015年被纳入于日本仙台举行的第三届联合国世界减少灾害风险大会。最近一次GP2019会议于去年5月在日内瓦举行，来自182个国家、400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76] GP将每三年举行一次，下一届定于2022年举行。我建议这次会议在日本召开，并集中讨论与极端天气和灾后重建有关的减少灾害风险事项。

2015年，第三届联合国世界减少灾害风险大会通过了《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简称《仙台框架》）。该框架提出了若干目标，包括至2030年大幅度减少受自然灾害影响的人数。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各国需要活用各自的经验，以便加强措施，减少极端天气造成的灾害风险。

2019年9月，在印度的倡议下，启动了抗灾基础设施联盟。这一国际伙伴关系将有助于加强技术支援和能力开发的协调，以发展相关设施，用作抵御长期受到关注的地震灾害，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近年来经历了越来越多气候灾害的日本也加入联盟。我建议日本发挥领导作用，通过与印度及其他成员国协力合作，为GP制定国际指针。

我进一步建议，以地方政府在面对气候引发灾害时所发挥的作用，作为下一届GP2022的主题之一，让会议成为各自治政府之间建立伙伴关系的机会。迄今为止，全球已有超过4300个自治政府签署了UNDRR的“增强城市抗灾力”（Making Cities Resilient）运动 [77]，蒙古和孟加拉国的所有自治政府均参与其中。[78] 今年是该运动开始以来的第十个年头，自治政府当局必须继续加强相互协调，重视管理极端天气所引发的风险。

全世界约有40%人口生活在离海岸100公里以内的土地 [79]，这增加了气候引起灾害的风险。绝大多数的日本人也生活在沿海地区。有鉴于此，我认为日本，以及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沿海地区自治政府，可以分享应对气候变化和减轻灾害方面的经验及有效做法，使亚洲整体能在减轻灾害危机方面达到相辅相成的效应。

今年6月，亚太减少灾害风险部长级会议将在澳大利亚举行。希望在会议上能深入讨论加强各自治政府间合作的机会，并透过GP2022会议将之扩大成为一项全球运动。

除了上述主题以外，我希望GP2022会议将优先讨论如何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使那些受气候灾害影响最严重的人士不至于掉队。

日内瓦的GP2019会议非常注重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包容。半数的小组成员和40%的参与者是妇女，此外还有超过120名残障人士参加。[80] SDGs倡导者之一、来自南非的爱德华·恩多普（Edward Ndopu）分享了他对灾后复原进程包容性的观点：残障人士占全球人口15%，是全世界最大的弱势群体。然而他们的存在经常被遗忘……（灾害时）残障人士被弃之不理及在日常生活中被排斥，这对残障人士的现实生活影响有着连带关系。[81]

两岁时被诊断患有脊髓肌肉萎缩症的恩多普强调，有必要重新检讨社会对灾后高风险群体的态度。我认为，这一点对任何强化灾后复原力韧性所作的努力，是不容忽视的，也是灾前风险管理和灾后复原的必要条件。只有促进社会“共生”的意识，加强日常生活中的相互联结，我们才能继续开发从灾难发生到灾后复原的能力，以成为守护民众生命与尊严的力量。

GP2019会议上，在减少灾害风险和建设复原力如何促进性别平等的环节中强调的重点之一，即是“于灾难中把平时被忽略的人们视为可见的存在”的重要性。^[82] 由于许多妇女的日常生活环境常被社会规范和歧视所遮掩，所以当她们一旦真正需要援助时，很可能就会被弃之不理。

当发生极端或不稳定的天气而需要疏散人们时，妇女往往是最后离开的人。尤其是家中男性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妇女们就必须留下来照顾老幼或生病的亲属。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一旦发生灾害，许多妇女都会成为支持和照顾社区民众的一大力量。

联合国妇女署强调，从灾后立即发挥领导力到社区抗灾能力的建设，妇女对减少灾害风险的实际和潜在贡献，是一项尚未被开发的重要社会资产。

人们往往受结构因素影响，模糊了真实存在的人或事物。这令我想起大乘佛教经典中一则关于“白昼的星星”的譬喻。尽管天上存在无数的星星，每颗星星都灿烂发光，但在白昼的阳光下，人们却不察觉它们的存在。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发生灾害时，妇女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地社区内建立相互支持的网络。因此，在制定灾害管理措施，包括地震和极端天气灾害等的每一步骤，都应该反映妇女的心声，这将是打造韧性社区的关键。

今年2020年是《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的二十五周年纪念。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为实现性别平等制定了明确的指针。宣言指出，提高妇女地位和实现性别平等是人权问题，也是社会正义的一项条件，因此不能仅仅将其视为妇女问题。这也是建构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唯一途径。^[83]

在减少灾害风险领域，性别平等精神也至关重要。无论是在减少灾害风险方面还是在气候变化造成的极端天气灾害中，加强复原力的措施不仅限于改善硬体基础设施。因此，我强烈认为，我们不仅必须努力确保性别平等成为现实，而且必须在我们努力建设社区复原力的同时，优先考虑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被忽视和遗弃的人。

多年来，SGI作为一个以信仰为基调的组织，定期参与GP等减少灾害风险的国际会议，同时在发生灾害期间参与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活动。2017年，SGI于墨西哥坎昆举办的GP2017会议上联合主办国际论坛，主题为“由以信仰为基调的组织（Faith-Based Organizations，简称FBO）主导社区的防灾——《仙台框架》的实践”。SGI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不同宗教的FBO伙伴共同发表联合声明 [84]，并在日内瓦举行的GP2019会议上也继续发表联合声明。 [85]

2018年3月，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SGI与其他四个FBO组织合作成立亚太地区信仰组织联盟（Asia Pacific Faith-Based Coali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简称APFC）；同年7月，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的亚洲减少灾害风险部长级会议上，APFC的五个团体提出了一份包括共同决意的联合声明：FBO使命的核心，是消除导致社会脆弱性的根本原因，以及为被社会遗弃的人们送上希望和幸福……以信仰为基调的团体，在防灾、增强复原力、推进社区人道主义行动的各方面竭尽其责地在完成任务。 [86]

SGI将与FBO组织分享这精神，继续致力于加强社会复原力，以建立一个包容性社会为愿景，确保所有人的尊严都得到维护。

危机中的儿童教育

我的四项建议中的最后一项，是关于加强支持因武装冲突或自然灾害而失去教育机会的儿童与青年们。我认为，守护承担下一代的儿童与青年的人权和未来发展至为重要，是建立可持续全球社会的基石。

今年9月迎来生效三十周年的《儿童权利公约》，目前拥有196个缔约国，比加盟联合国的国家数目还多，是全世界最为普遍的人权条约。公约规定，政府有义务确保所有儿童的教育权利，事实上，小学学龄儿童失学的比例从公约生效（1990年）的20%左右减至2019年约10%以下。 [87] 尽管取得了显著进展，生活在遭受冲突和受灾国家的数百万儿童和青年，仍然面临严峻的教育相关问题。

例如长期饱受冲突蹂躏的中东国家也门，约240万学龄儿童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 [88] 很多学校设施成为攻击目标，遭到严重破坏，甚至被征用作为军事据点或避难所。孟加拉国一再受到气候恶化加剧的环境灾害影响，许多家庭陷入贫困和流离失所。人们担忧儿童的健康状况，而且越来越多儿童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

目前，全球有超过1亿400万名儿童和青年因冲突和灾害而被剥夺教育机会。^[89] 然而，只有2%的人道主义资金分配额用于教育领域。^[90] 在救济活动中，教育通常不如生存所需的食物和医疗用品那么受重视。即使在复原重建阶段开始后，教育也一直是人们最后关注的领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简称UNICEF）强调，学校作为儿童恢复日常生活的场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学校与同学在一起，能使儿童获得心理的治疗，从来自冲突或灾区长大的创伤经历中复原过来。

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

2016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了首届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目的在藉由建构一个更广泛且更多样的体系，从根本上改革全球的人道救援系统，以期能对当今各种危机做出更有效的回应。首脑会议聚集了来自180个成员国家的超过9000位代表，包括55位国家或政府领导人，数百位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以及以信仰为基调的团体代表，还有来自私人团体和学术界的合作伙伴。

在此背景下，于2016年举行的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上，设立了由UNICEF主导的“教育不能等待”（Education Cannot Wait，简称ECW）全球基金。这是第一个专门用于支援教育紧急情况和长期危机的基金，至今为超过190万名陷入紧急人道危机的儿童提供了教育机会。^[91] 教育是遭受危机打击的青年重要的基础，能让他们重拾安全感与希望，并怀抱梦想，继续走向未来。教育也是为社区和社会带来和平与稳定的重要资源。

正如ECW教育基金主任亚辛·谢里夫（Yasmine Sherif）指出，如果社会上的市民和难民们，既不能书写亦不能阅读，欠缺理论性思辨能力，又

没有教师、律师和医生，该如何构筑一个可发展社会经济的社会呢？……教育是促进和平、宽容和互相尊重的钥匙。让男女儿童平等接受教育，可以减低暴力与纠纷发生机率的37%。^[92]

SDGs的目标包括确保所有儿童完成优质教育。我们绝不能遗弃生活在冲突或灾难国家的儿童与青年，让他们成为“失落的一代”。

ECW教育基金于2016年成立时，估计每年需要支出85亿美元，为受危机影响的大约7500万名儿童提供基础教育，相当于每个儿童每年花费113美元。^[93] 如今，需要援助的儿童人数已增至1亿400万。^[94] 其实，只要将每年估计1兆8000亿美元的全球军事开支^[95] 中拨出一小部分，已足以支持全球的教育需求，使生活在恶劣条件下的数百万青年，能够迈出充满希望的一步。

我敦促国际社会巩固ECW教育基金的财政基础，以便加强紧急情况下的教育支援。这将对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全球社会作出重大贡献，保障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和安全地生活。

我在2009年的《和平倡言》中，呼吁扩大国际合作税等创新融资机制，以加速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进程。如今要实现其后继的SDGs更需要加倍努力。此时应该为实现这一目标展开商讨，如何通过其他管道筹集更多资金，包括设立一项专门用于教育的国际合作税。

目前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实施的机票税，正作为国际资金的来源，以协助发展中国家患有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传染病的病人。创新融资框架的其他例子，包括五年前为防治长期儿童营养不良而设立的“UNITLIFE”。

去年7月举行的七国集团（G7）发展部长级会议上，担任创新发展融资领导小组主席的日本，讨论了创新融资方法的必要性，例如国际合作税用于致力开发的领域。日本与UNICEF合作，发动资源向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儿童提供援助，包括向10万名小学生分发教科书和6万2000名儿童提供学习用品和书包。^[96]

在人道援助不足的阿富汗地区，日本资助了70所学校的建设，使5万名儿童能够在适当的环境中学习。^[97]我敦促日本利用其支持海外教育发展的丰富经验，积极加强ECW教育基金的财政基础，并带动讨论制定新平台，将更多国际合作资金充作教育基金。

我想分享联合国难民署的一个事例，显示当流离失所的家庭能够在接受庇护的地方获得教育时，会在儿童与家人心中燃起希望的灯火。一名年轻母亲和她的两个孩子被迫逃离面临严重社会和政治动荡的尼加拉瓜。她决定把儿子和女儿从学校带走一起到邻国哥斯达黎加避难。这是令人心痛的决定，但眼前的危机让她别无选择。去学校领取孩子的成绩册和证书也需要冒着生命危险，一家人只带着一个小行李就离开了家园。最令母亲担心的是孩子们在新的国家能否上学。

所幸她发现哥斯达黎加保障所有儿童能接受免费的小学教育。此外，该国北部的许多学校为了方便难民家庭，放宽了入学要求，允准没有正式证件的儿童进行入学登记。一些学校还为失学已久的儿童提供额外的学习课程，帮助他们追上进度。多亏有了这教育系统，她的两个孩子才得以继续接受教育。

她十四岁的儿子表示，对于仍有机会再次学习感到非常高兴，并梦想有一天能成为医生。他每一天牵着十岁的妹妹精神奕奕地上学。正如学校的一位老师说，他的目标是帮助那些被迫离开家园的孩子，能够在校园内感受到像“在家”一样。^[98]

由于人道危机而被剥夺受教育机会的1亿400万学龄儿童，这个惊人数字背后的每一个儿童都有各自的人生故事。只要确保这些儿童能平等地接受教育，就会使他们重新获得希望，成为他们朝着自己人生目标前进的基础。

教育、和平、文化——是SGI在19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社会活动的三大支柱。这些活动旨在促进“民众的、由民众发起的、为民众的自强运动”。

象征这SGI运动的精神源流，刊印在九十年前（1930年11月18日）出版的《创价教育学体系》封面设计。那是创价学会两位会长——牧口常三郎与户田城圣，这两位教育家的师弟精神结晶。封面插图描绘了一盏油灯，其光线驱散了四周的黑暗。

当社会处于动荡或充满威胁时，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儿童和青年。牧口会长亲眼目睹这样的情况，深感痛心。他全身心投入教育最前线的小学教育，全力以赴地点燃儿童心中的希望之光，同时不断探索能够使人们拥有创造幸福能力的人本教育模式。牧口会长的心血结晶就是《创价教育学体系》这本旷世著作。

牧口会长三十多岁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期间（1904-1905），他致力于促进当时在日本普遍落后的女性教育。许多家庭在经济上举步维艰，往往因战争而死亡、受伤或生病而失去主要养家糊口的人。他通过学费援助计划，帮助这些家庭的学生得到全额资助，或者减免50%的学费。

四十多岁时，他在一所专为贫困家庭设立的小学担任校长。期间，他拜访并帮助照顾患病的儿童，也为营养不良的儿童安排学校餐点。牧口会长之所以竭尽全力支援学生，是因为他也曾经历因家庭环境而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

1923年关东大地震摧毁了东京地区，当时牧口会长五十多岁。许多儿童被迫搬迁到新学校，牧口会长就在他当校长的学校热烈欢迎他们，并为儿童提供必要的学习用品。他也关心教过的学生们的健康和处境，亲自走访曾执教过的学校的社区，一一确认他们的安全。

同样，作为牧口会长的弟子，户田会长不顾战时的限制，在1940年至1942年期间出版了35期儿童教育杂志。户田会长对儿童的幸福和福祉的真诚愿望从未减弱，就算他与牧口会长一起被控违反军政府的思想统制而入狱。牧口会长更在狱中殉教。

两年的牢狱生活，没有摧毁户田会长的信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个月，他获释出狱，第一步就是为儿童开办函授课程。由于许多学校在战后的混乱中无法运作，户田会长努力确保教育机会得以延续下去。

从创价学会的历史得以证明，两位会长心中，脉动着“对于处于任何情况的儿童们，也要继续燃点他们心中的教育灯火”的信念。《创价教育学体系》的出版日期即是创价学会的创立日，我相信，封面上的油灯插图，体现了两位会长对教育的信誓与行动。如油灯所隐喻，教育的火焰需要有人支撑才不会熄灭。只要有倾注热情的人们以及给予支持的社会，教育之光必定能够持续发亮。

我继承了先师牧口会长和户田会长的火炬，在各国建立了教育机构网络，包括东京和大阪的创价初中和高中、日本创价大学和美国创价大学，以及巴西的创价学园。逾半个世纪内，我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进行对话，竭尽所能建立一个“为教育的社会”、一个确保儿童从现在以至未来都能享有尊严与幸福的社会。

SGI今后会继续呼吁“为教育的社会”的重要性，并努力提高人们对此的意识。同时致力于促进“民众的、由民众发起的、为民众的自强运动”，以不断扩大的全球团结力量，应对气候危机和其他挑战。

脚注：

- [1] **联合国2019年气候行动峰会闭幕新闻稿**。联合国气候行动网站。
- [2]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关于气候变化的评论**（Remarks on Climate Change）。联合国秘书长网站。2018年9月10日。
- [3] 约翰·R·坎贝尔。**大洋洲的气候变化、移徙和土地**（Climate Change, Migration and Land in Oceania），4页。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
- [4]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风沙星辰**（Wind, Sand and Stars）。27页。
- [5]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上的发言**。联合国秘书长网站。2019年9月24日。
- [6] 牧口常三郎。**牧口常三郎全集（第二卷）**。397页。
- [7] 同上，第一卷。13页。
- [8] 同注6。399页。
- [9] **实际GDP增长**（Real GDP Growth）。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
- [10] **稳定三年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上升**（Glob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Set to Rise After Three Stable Years）。未来地球网站。2017年11月13日。
- [11] 阿比吉特·V·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穷人经济学：彻底反思如何对抗全球贫穷**（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ix页。
- [12] 同上，70页。
- [13] 同上，138页。
- [14] 中村元。**佛陀的话语**（ブツダのことば）。135-136页。
- [15] 池田大作、安瓦尔·K·乔杜里。**创造新地球社会——畅谈和平文化与联合国**。208页。
- [16] 同上，221页。
- [17] 户田城圣。**户田城圣全集（第四卷）**。62页。
- [18] 达格·哈马舍尔德。**联合国日音乐会的致辞**（Remarks at United Nations Day Concert）。联合国网站。1960年10月24日。
- [19] 同上。

- [20] **特别报告：全球暖化摄氏1.5度 决策者的摘要**（Special Report: Global Warming of 1.5°C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网站。
- [21] 池田大作、埃莉斯·博尔丁。**让和平文化之花盛开**（Into Full Flower: Making Peace Cultures Happen）。92页。
- [22] 中村元。**释尊的一生**（釈尊の生涯）。57页。
- [23] 卡尔·雅斯贝尔斯。**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大哲学家**（Socrates, Buddha, Confucius, Jesus: The Paradigmatic Individuals）。26页。
- [24] **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御义口传，815页。
- [25] 同上，773页。
- [26] **一万亿棵树运动**（Trillion Tree Campaign）。地球植林计划网站。
- [27]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气候行动峰会闭幕辞**（Remarks at Closing of Climate Action Summit）。联合国秘书长网站。2019年9月23日。
- [28] 玛丽安·施纳尔。**与马塔伊对话**（Conversation with Wangari Maathai）。女权主义者网站。2008年12月9日。
- [29] **联合国在成立七十五周年的2020年就世界的未来进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对话**（UN to Launch Biggest-ever Global Conversation on the World's Future to Mark Its 75th Anniversary in 2020）。联合国网站。2019年10月24日。
- [30]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就联合国秘书长在2020年优先处理的课题于联合国大会发表的致辞**（Remarks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the Secretary-General's Priorities for 2020）。联合国秘书长网站。2020年1月22日。
- [31] **于联合国，青年活动家要求各国领导人对气候紧急状态立即采取行动**（At UN, Youth Activists Press for Bold Action on Climate Emergency, Vow to Hold Leaders Accountable at the Ballot Box）。联合国新闻网站。2019年9月21日。
- [32] **气候罢工后760万人呼吁紧急行动**（7.6 Million People Demand Action After Week of Climate Strikes）。全球气候罢工网站。2019年9月28日。
- [33] 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谈气候变化：“零碳是我们的唯一选择”（Christiana Figueres on Climate Change: 'Net Zero Carbon is Our Only Option'）。科学焦点网站。2019年10月2日。
- [34] 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脱碳的五原则（脱炭素化への五つの原則）（2019年4月4日）。**圣教新闻**，第2版。
- [35] **全球高等教育机构发出气候危急宣言**（Higher and Furt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cross the Globe Declare Climate Emergency）。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网站。2019年7月10日。
- [36] **关于我们**（About Us）。全球市长气候与能源盟约网站。
- [37] 同注31。
- [38] 奥雷利奥·贝恰。**留给未来的一百页：罗马俱乐部主席的思考**（One Hundred Pages for the Future: Reflection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Club of Rome）。178页。
- [39] 奥雷利奥·贝恰。**人的素质**（The Human Quality）。13页。
- [40] 同上，67页。
- [41] 同上，101页。
- [42] 池田大作、奥雷利奥·贝恰。**二十一世纪的警钟**。164页。
- [43] **地球应急方案：为了人类、自然和气候确保新政策**（Planetary Emergency Plan: Securing a New Deal for People, Nature and Climate），7页。罗马俱乐部、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

- [44] 大会主持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政治宣言。联合国大会。
- [45] 格蕾塔·通贝里。格蕾塔·通贝里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的演讲全文（Greta Thunberg UN speech at COP25 in Full）。每日快报网站。2019年12月11日。
- [46] 条款现况（Status of Treaties）。联合国条约集。
- [47]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主任表明，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在核战的风险最高（Risk of Nuclear War Now Highest Since WW2, UN Arms Research Chief Says）。路透社网站。2019年5月22日。
- [48] 禁止核武器条约，1页。联合国大会。
- [49]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日内瓦大学就启动裁军议程发表讲话（Remarks at the University of Geneva on the Launch of the Disarmament Agenda）。联合国秘书长网站。2018年5月24日。
- [50] 梅拉夫·达坦、于尔根·舍弗兰。瓶子外的威胁：核裁军的威力与逻辑（The Treaty is Out of the Bottle: The Power and Logic of Nuclear Disarmament）。130页。
- [51] 同上。
- [52] 2019年禁止核武器监测报告：跟进如何朝向无核武世界（Nuclear Weapons Ban Monitor 2019: Tracking Progress towards a World Free of Nuclear Weapons），4页。挪威人民援助组织。
- [53] ICAN号召城市活动（ICAN Cities Appeal）。国际禁止核武器运动网站。
- [54] 原爆幸存者的呼吁：超过1050万人签署支持废除核武器（‘Appeal of the Hibakusha’: More Than 10.5 Million Signatures Supporting Call for the Elimination of Nuclear Weapons）。联合国裁军事务厅网站。2019年10月18日。
- [55]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项一般评论第36（2018），有关生命的权利（General Comment No. 36 (2018) on Article 6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on the right to life），第66段。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 [56] 同上，第2段。
- [57] 同注48，3页。
- [58] 创价学会青年部。广岛与长崎：我们不会忘记（Hiroshima and Nagasaki: That We Never Forget）。
- [59] 裁军与安全独立委员会。共同安全报告：生存的蓝图（Common Security: A Blueprint For Survival）。139页。
- [60] 池田大作。池田大作全集（第一卷）。102页。
- [61] 罗纳德·W·里根。美国生活：里根自传（An American Life: The Autobiography）。267页。
- [62] 同上，595页。
- [63] 于日内瓦峰会发表的美苏联合声明（Joint Soviet-United States Statement on the Summit Meeting in Geneva）。美国总统计划网站。1985年11月1日。
- [64]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保护我们的共同未来：裁军议程（Securing Our Common Future: An Agenda for Disarmament）。联合国裁军事务厅。
- [65] 中满泉。第二届禁核试条约科学与外交研讨会高级别会议主题演讲（Second Comprehensive Nuclear-Test-Ban Treaty Science Diplomacy Symposium, High Level Session: Keynote Speech）。联合国裁军事务厅。
- [66] 政治宣言：会议“2019年掌握技术，反思军备控制”（Political Declaration: Conference “2019. Capturing Technology. Rethinking Arms Control”）。德国联邦外交部办事处网站。2019年3月15日。
- [67] 强化审查条约程序：不扩散核武器条约（Strengthening the Review Process for the Treaty: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联合国大会。
- [68] 同注49。

- [69] **人工智能对战略稳定与核风险的影响，第一卷：欧洲大西洋的展望**（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 Strategic Stability and Nuclear Risk, Volume 1: Euro-Atlantic Perspectives），23页。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 [70] 同上，95页。
- [71] 同上，19-20页。
- [72] 同上，51页。
- [73] 约翰·F·肯尼迪。**华盛顿美利坚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说**（Commencement Address at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约翰·F·肯尼迪总统资料库、博物馆网站。1963年6月10日。
- [74] 同注69，121页。
- [75] **气候所引发的灾难每年令全球超过200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流离失所**（Climate Fuelled Disasters Number One Driver of Internal Displacement Globally Forcing More Than 20 Million People a Year from Their Homes）。国际乐施会网站。2019年12月2日。
- [76] **第六届全球减少灾害风险平台摘要**（Summary of the Sixth Session of the Global Platform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网站。2019年5月20日。
- [77] **增强城市抗灾力：我的城市有备无患**（Making Cities Resilient : My City is Getting Ready）。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网站。
- [78] **孟加拉国全体参与城市运动**（Bangladesh Joins Cities Campaign En Masse）。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网站。2018年7月2日。
- [79] **概况介绍：人民与海洋**（Factsheet: People and Oceans）。联合国海洋大会。
- [80] 同上76。
- [81] 全球减灾和灾后恢复基金（2019年5月31日）。**世界重建大会：残疾人士灾后恢复**（WRC4: Disaster Recovery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 [82] **提升妇女对于减少灾害风险与复原力的领导能力**（Promoting Women’s Leadership i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d Resilience）。联合国妇女署网站。2019年5月31日。
- [83] **《北京宣言》与《行动纲要》**（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for Action）。联合国妇女署。
- [84] **以信仰为基调的组织致GP2017的公共联合声明**（Public Joint Statement of Faith-based Organizations to GP2017）。全球减少灾害风险平台。
- [85] **以信仰为基调的组织致全球减少灾害风险平台的联合声明**（Joint Faith Based Organizations’ (FBOs) Statement for the Global Platform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GPDRR)）。行动联盟及其他。
- [86] **以信仰为基调的组织致亚洲减少灾害风险部长级会议的联合声明**（Joint Faith Based Organizations’ (FBOs) Statement for the Asian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亚太地区信仰组织联盟。
- [87] **为每一个儿童争取他们的权利：有关儿童的权利大会**（For Every Child, Every Right :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at a Crossroads），7页。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88] **也门返校计划**（Going Back to School in Yemen）。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秘书处网站。2019年1月7日。
- [89] **三分之一居住在受战争或自然灾害影响的国家的儿童和青少年失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 in 3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Is Out of School in Countries Affected by War or Natural Disasters - UNICEF）。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网站。2018年9月18日。
- [90] **7500万受危机影响的儿童急需教育支援**（75 Million Crisis-affected Children are in Urgent Need of Education Support）。教育不能等待网站。
- [91] **成果报告**（Results Dashboard）。教育不能等待网站。2019年12月3日。

- [92] **世界性人道主义危机的蔓延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无法接受教育** (World's Spreading Humanitarian Crises Leave Millions of Children Without Schools or Education)。国际通讯社网站。2019年10月24日。
- [93] 同上。
- [94] 同上89。
- [95] **世界军事支出在2018年增至1兆8000亿美元**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Grows to \$1.8 Trillion in 2018)。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网站。2019年4月29日。
- [96] **政府开发援助 为万名儿童提供高质量教育：日本的措施** (政府開発援助 万人のための質の高い教育：日本の取組)。日本外交部网站。2016年8月9日。
- [97] 同上。
- [98] **哥斯达黎加学校向尼加拉瓜的流离失所儿童敞开大门** (Costa Rican Schools Open Their Doors to Displaced Nicaraguan Children)。联合国难民署网站。2019年7月5日。